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七期；83-104頁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1年12月

文人的自我獨白 ——解析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

郭乃禎*

【摘要】

歷史上第一個以自傳式的寫作方式為自己發聲者，起源於屈原的〈離騷〉，〈離騷〉一開始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在這一篇歷史長詩當中，屈原自敘世胄、生辰與命名，飛揚於人生的理想，哀痛仆踣於信讒齟齬，乃至執著於再三追尋，以死為諫的忠烈悲慨，已為文人自我獨白的寫作方式，寫下畫時代的里程碑。而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體式，寫於死生大限之期，真情流露，對於筆耕一生的文者，當具有回顧自省、褒貶評價的意義，或得、或失，或憾，或否，文人如何為自己蓋棺論定，必有可觀之作，本文將取陶淵明〈自祭文〉、張岱〈自為墓誌銘〉解析之，推究其內涵、價值、特色與成果，並兼及歷代自祭自撰墓誌銘之作。

關鍵詞：自祭、自撰墓誌銘、張岱、陶淵明、生死之作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講師

Literati's Monologues: Analysis of Self Obituary and Self Written Epitaph

Guo, Nai-Zhen*

Abstract

Li Sao (離騷) was the first autobiographical ode written by Chu Yuan (屈原)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ode, Chu Yuan describ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date of birth and the reference of his name. The writer also expressed his aspiration but lamented for his frust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king's ignorance and scorn. The whole piece of writ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a literatus' monologue. Self obituary/epitaph, on the other hand, was an anomalous form of autobiography, which was derived from the monologue style of *Li Sao*. As a literatus, the writer made a final judgment on himself. When retrospectively to his whole life, the writer had a self-reflection on his merits. There might be recognition, achievement, critique, regret, gain and loss. This article takes *Self Obituary* (自祭文) authored by Tao Yuan-Ming (陶淵明) and *Self Written Epitaph* (自為墓誌銘) authored by Zhang Dai (張岱) as examples, and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ir meanings, literary values,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this writing style.

Keywords: self obituary, self written epitaph, Zhang Dai, Tao Yuan-Ming, a writing of life and death

*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歷史上第一個以自傳式的寫作方式為自己發聲者，起源於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離騷〉，〈離騷〉一開始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¹在這一篇文章長詩當中，屈原自敘世胄、生辰與命名，飛揚於人生的理想，哀痛仆踣於信讒齟齬，乃至執著於再三追尋，以死為諫的忠烈悲慨，已為文人自我獨白的寫作方式，寫下劃時代的里程碑。《史通通釋》：「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迹，實基於此。」²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以孔子發端，說明紹承著述的原委：繼承父命，以編纂為世職，是孝子的表現；尊尚朝廷，以推崇之心論著，是忠臣的表現也；宗主孔子，依傍於《春秋》而筆法之，是史家之所當為。並且論及先祖、父親典事於史、以及遊學述職志意所趨向，雖然是《史記》一書的創作始末，但又具有自傳的特質。《史通通釋》：「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³〈與楊德祖書〉：「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⁴曹植（192年—232年）意氣鋒發的筆端，舒展了生命的藍圖，同樣是自我價值的剖判。

包括揚雄（前53年—18年）〈逐貧〉之賦，韓愈（768年—824年）〈送窮〉之文，或是「徒行負負，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⁵之苦，或是「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⁶之所煎迫，何嘗不是文人自剖式的獨白。而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體式，

¹ 戰國·屈原，《楚辭注釋》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殷光熹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6月大陸初版，1993年9月臺灣初版，頁7。

²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序傳》清·浦起龍釋，白王崢校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256。

³ 同註2，頁257。

⁴ 南朝梁·蕭統，《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9月6版，頁604。

⁵ 《兩漢魏晉十一家文集·揚雄》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5月，頁16。

⁶ 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冊二，《四部備要》據東雅堂本，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3月1版，卷卅六，頁3。〈送窮文〉：「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行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寫於死生大限之期，莫不直言吐實，真情流露，對於筆耕一生的文者，雖終其一生悠遊於筆墨之趣，所言萬端，無所不吐。但是祭銘之作，更當具有回顧自省、褒貶評價的意義，或得、或失，或憾，或否，文人如何為自己蓋棺論定，必有可觀之作，本文將取陶淵明（約365年—427年）〈自祭文〉、張岱（1597年—1679年）〈自為墓誌銘〉解析之，並兼及歷代自祭自撰墓誌銘之作。

貳、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由來及特色

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屬於祭弔類和碑銘類的文體，《文心雕龍·哀弔卅》：「弔，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⁷祭弔類的文字為弔喪之賓到來，以言辭悼慰亡者在天之靈。詹鍇（1916—1998），曰：「弔文之作，往往是對古人致追慕、追悼或追慰之意。對於死者，或悲其有志而不成功，或傷其懷才而不見用，或怪其狂簡而遭累，或惜其忠誠而殞身。以惻剴切，使讀者能明是非，辨邪正為目的。」⁸因此祭文多兼有志意未竟，懷才不遇之悲，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之痛，賈誼（前200年—前168年）〈祭屈原文〉之「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⁹備考亡者生前之事，而以清新的文辭表達哀傷，可說是古今祭弔之文的典範。

墓誌銘的體裁特色，如明·徐師曾(1546-1610)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¹⁰《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¹¹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古時銘刻於器，如鼎銘，盤銘。秦、漢以後，或刻於石，如班固（32年—92年）〈封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一般稱為碑銘。墓誌是碑銘的一種，存放於墓中。記載死者生平功業，是個人歷史的濃縮，寫作墓誌銘者，乃立德、立言、立行，為亡者留名。尚繼武(1970-)：「現考最早的自題墓誌銘是漢哀帝時馮州

⁷ 南朝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3版，頁475。

⁸ 同註7，頁478。

⁹ 同註7，頁479。

¹⁰ 明·吳訥、徐師曾合著，《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頁148。

¹¹ 漢·戴德、戴聖，《十三經注疏》八，《禮記疏卷》鄭沅注，孔穎達疏，據嘉慶20年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卷四十九，頁十八，頁838。

刺史杜鄴為自己撰寫的。葛洪《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歸於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晏息。」及死後，命刊名，埋於墓側。』¹²，而文人自撰墓誌銘則以唐王績為始。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志者以散文記敘死者姓名、籍貫、官級、功蹟。銘者以韻文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

貞觀十八年，王績（585年—644年）病逝家中，其自撰墓誌銘曰：「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¹³通篇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為文眼，以莊子思想「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潰潰癰」¹⁴為基調。「有道」者，追慕陶潛真率疏放，曠懷高致之風，行己有道。「無功」者，對隋末唐初天下動盪、政治鬥爭激烈表達不滿，一生無所作為。王績仿陶潛〈自祭文〉，作〈自作墓志文〉，仿〈五柳先生傳〉，作〈五斗先生傳〉，仿〈桃花源記〉，作〈醉鄉記〉。在〈醉鄉記〉記中，虛擬醉鄉「去中國不知幾千里」，處境幽美，得以安居，可以說是陶潛的忠誠追隨者。自唐而後，文人自撰墓誌之作源源不絕。例如：嚴挺之、顏真卿、裴度、韓昶、杜牧、徐渭、張岱等等，皆有自撰墓志之作。

參、創作背景—生死有期與顛躓窘困的交相煎迫

宋徽宗即位，蘇東坡（1037年—1101年），年屆六十六，從儋州北歸，途經金山寺，寫下《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一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¹⁵成為回顧人生歷程的喟嘆。面對人命奄乎有時而盡的窘迫，與世事輾轉壘礙交切的橫逆，誰能無痛呢！陶淵明出生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長沙郡公。祖父陶茂作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任安成太守，早逝，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陶淵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及彭澤縣令等職，後「不為五鬥米折腰」，辭官回家。行年五十初患瘧病〈與子儼等疏〉：「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¹⁶已有臨終遺言之口吻，直至寫自祭文六十三歲，可謂宿疾纏身，貧病交迫。據《宋書·隱逸傳》所考證，陶淵明死於南朝宋元嘉四年九月，由於疾病的折磨，生命的日漸衰損，使他

¹² 尚繼武，〈自為墓志寫心曲—張岱的特異文化人格探窺〉《前沿》，2005年，第5期，頁206—209。

¹³ 唐·王績，《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6月）頁310。

¹⁴ 戰國·莊子，《莊子·大宗師》，陳鼓應註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6版，頁213。

¹⁵ 宋·蘇軾，《蘇軾詩集》下冊，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頁2641。

¹⁶ 東晉·陶潛，《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頁441~442。

耗盡生命力而視死如歸。他的〈挽歌詩〉：「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¹⁷自陳蕭條悲涼之景。〈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先寫年，再寫季節月份，寒意乍升而景色凋敝，寫於祭文之中，特別能感受生命暖度的消逝。大雁南飛遠去，觸發大去之遠行，一去不返的意象，而枯黃的草木也令人聯想到生命的凋零。雖豁達如陶潛，能對大去之期而無感乎！

徐渭（1521年—1593年）是明代晚期的書畫家、文學家、戲曲家，袁宏道（1568年—1610年）〈徐文長傳〉寫其「雅不與時調合」，「屢試屢蹶」，「不得志於有司」¹⁸，造就他成為一個懷才不遇的知識份子，滿懷狂放與悲憤，不惜以生命與世俗相抗衡。嘉靖四十三年胡宗憲（1512年—1565年）因「黨嚴嵩罪」入獄，並畏罪自盡，徐渭哀之，作〈十白賦〉。時胡宗憲案搜查甚嚴，徐渭深感危殆，作〈自為墓志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¹⁹傳世著述有《徐文長全集》、《徐文長佚稿》、《徐文長佚草》，劇本《四聲猿》、《歌代嘯》，嘉靖三十八年撰成戲曲理論著作《南詞敘錄》。書法有《青天歌卷》、《詠墨磁軸》、《題畫詩》，繪畫有《墨葡萄圖》、《山水人物花鳥》、《牡丹蕉石圖》、《墨花》等，所作遍及書畫曲文。因一生顛簸，妻與子俱違，孤高疏狂，袁宏道：「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²⁰其〈自為墓誌銘〉：「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裊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²¹一生受盡屢挫屢仆的折耗，仍保有「不浼袒裊」的樸真，屢臨死生的試煉，仍不免於忐忑，其銘曰：「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競系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啜涓，即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²²可以無死，可以無生，生死無常，或微服，或佯狂，如何做到有智慧而能明哲以保身呢？直到寫作銘文的此刻，徐渭深有受盡命運鞭撻的憂悵。

張岱處於明朝危急存亡之秋，目睹忠臣烈士以身殉國，以死明志，而〈陶庵夢憶序〉曰：「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駢駢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

¹⁷ 東晉·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據陶文毅集注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四，頁5。

¹⁸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一）》，臺北：偉文出版社，1976年）頁311~316。

¹⁹ 明·徐渭，《徐文長三集（四）》（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頁1549-1553。

²⁰ 同註18。

²¹ 同註19。

²² 同註21。

愕望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²³清兵入關，國破家亡，無法從容就義以表彰氣節的悲痛，啃蝕他的一生，張岱曰：「忠孝兩方，仰愧俯作。聚鐵如山，鑄一大錯。」²⁴在兵燹烽火的延燒中，日以繼夜地炙烙心靈的便是「忠義」二字。其〈自撰墓誌銘〉曰：「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生不逢時的悲慟流竄在時代中，無論陶潛、王績、蘇軾、徐渭、張岱無不遭難而惶惶，「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的蹙迫，讓他們寫下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文字。因世事所侷限，人有「當為」而「不能為」的無奈，但是生於天地之間，卻能有「不與草木俱腐」的昂然，這是對自我「生」的價值的評判，有誰能放棄呢？

肆、自祭文與自為墓誌銘的內涵與價值

一、面對時運乖舛的態度—自我價值的剖判

張岱出生於書香門第，家學淵源。高祖天複，官至雲南按察副使，甘肅行太僕卿。曾祖張元汴狀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為萬曆進士，官至廣西參議。父張耀芳，副榜出身，為魯藩右長史。先輩均工詩文而有著述。張岱早年生活優渥，受到晚明崇尚性格，不拘禮俗以及狂放自由的影響。〈自撰墓誌銘〉曰：「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嬖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明亡後避居山野，所處困窘，以其博通經史，洽聞子集之能，著述不輟，墓誌銘曰：「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雖不能以身相搏成為義烈，而他回應時代的卻是「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俠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

墓誌文中張岱對於少時所浸潤的高情逸興，流連玩賞的諸般風月，既自負不凡，如同對故國的悔愧，又有自我批判的笞楚。《夢憶序》：「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

²³ 明·張岱，《張岱詩文集·瑯嬛文集卷之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0。

²⁴ 同註23，〈瑯嬛文集卷之五·蝶庵題像〉，頁332。

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²⁵對於遍及經史文集的文化事業，既有寫作《石匱書》「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²⁶的使命感，又有處困不屈，發憤著書的精神，使其風燭草露年屆垂暮，尚能聊以昂揚。余德余：「著《石匱書》就是『存國史』，『存國史』就是為了『存明』、『復明』。」²⁷所以墓誌銘末云：「曾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冢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雖有臨老之悲慨，出落於字句間尚有「取於項里」的自得，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²⁸余德余：「項羽是張岱崇敬的英雄，其當年反抗暴秦正和自己寄籬在清暴政下頑強抗爭可引為同調。」²⁹這是他面對乖舛所取的應對態度，也是他忍辱苟生，以保存國史的方式，抗爭到底的自我評價。

顏延年（384年—456年）〈陶徵士誄〉：「年在中身，疢維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³⁰既寫出陶淵明五十歲以後貧病交迫的現況，也寫出曠達灑脫以待天命的性格。陶淵明〈自祭文〉：「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上句傳達了生成為人的慶幸，下句表達了生而為人，卻生不逢時的乖舛。以「余為人」三字承上啟下，形成「幸」與「不幸」的落差。一般人面對這樣的狀況，大概會悲痛不能自己，會藉文意的起落表達懷才不遇的牢騷，特別是一個才華揚溢之人。但陶淵明卻是「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懷著喜樂到山谷打水，擔負柴薪時邊走邊唱歌，直至天色昏暗，才在暮色中，抵達從早候我到晚的家門。陶淵明表達了不悲不嘆，無怨無悔的豁達，掬取山谷之清泉，所得的豈僅僅是流水，還有來自大自然源源不絕的澄澈，山野清新的氣流，也足以淘洗他的心靈，成為真正豐潤生命的資源，若非如此，怎能忍受一生的侷促？必定是此中有真樂，有充沛滿盈的富足，讓他拋離了形骸上的不足。所以當他背負薪柴而肢體勞乏之餘，能夠長歌嘯野，成為一個快樂的樵夫。在早出晚歸、勞多獲少中返家，能以樸素簡陋的家門做為生命的依歸。離開了日暮的原野，回到家又敞開另一扇樸實，讓

²⁵ 明·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尋夢》，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9-20。

²⁶ 同註23，〈瑯嬛文集卷之一·石匱書自序〉，頁100。

²⁷ 余德余，〈甘灑熱血存「春秋」—張岱〈自為墓誌銘〉現象窺探〉，2004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4卷第3期，頁43。

²⁸ 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第七》，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300。

²⁹ 同註27，頁42。

³⁰ 南朝宋·顏延年，〈陶徵士誄〉，蕭統，《文選（六）》（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頁2469-2475。

這樣裡外通透的自由，陪伴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陶淵明的自祭文中，以簡短的「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四句縮影其田園生活，但是脫溢於文字的，卻是掩不住的快樂與滿足。

「含歡」與「谷汲」，「行歌」與「負薪」，「翳翳」與「柴門」都是對立的感受，每一句都有形骸上的勞苦，但也都賦予心靈上的喜樂，特別突顯了樂在其中的感受。前句「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寫日復一日，穿梭於原野自然的暇適自在，相形之下，所謂體膚之勞，更顯得微不足道。後句「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有迺繁。」寫年復一年，忙碌於田園農耕的陶然自得，所謂「耘耔」、「繁育」皆有兩面的解讀與表白。一則是艱辛的勞動與肉體的疲憊，一則是參讚大地生生不息的化育與成長。從字表上雖忙碌於耘耔繁育，所得到的卻是禾苗蓬勃的生機，由中可以體會出作者農耕生活的怡然自得。相對於為官領俸，耕作所獲更令人心安理得，陶淵明深耕細耨的，當不如是農田，還有他為自己所留下的那一畝自在的心田。

〈自祭文〉云：「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讀書以自愉樂，彈琴以相唱和。冬來則曝曬日下，享用天地給予的溫暖照拂，夏日則在冰涼的泉水中洗滌，享用澄淨無暇的清涼。本句鋪寫陶子的生活實況，特別能彰顯怡然自樂的充實度。以讀書汲取哲理，暢通於心靈思路，以古琴滋補聰明，優遊於清音雅樂。寒冬中自有暖日，炎夏中自有清泉，儘管生活總是夾雜嚴苛的考驗，但也蘊含無限的生機，特別是來自樂天知命的人，總能夠在嚴寒中看到晴日曝曬之溫暖，能夠在炙熱中浸潤通體涼徹的樂趣。生活中唾手可得的情致，不在用高價求索，而在靈通的體悟。「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辛勤勞動從來沒有停歇，而心裡卻常保有餘裕的自在空閑，樂於讓生命的步伐與自然的變化應節合拍，順隨本分，以窮其一生。

在陶淵明生於晉宋之際，群雄爭霸，政治腐朽的年代，儘管在大動蕩的年代中，有許多的追隨者，但是真能從積極濟世的抱負中隱退，順隨生命的節奏與步伐，走竟「清冽」且「樂至」的一生，當足以自得，而成為自撰祭文之由。自祭之作正如：東坡所言：「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曠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³¹

二、生命歷程的省思—悔與悟的選擇

陶淵明〈自祭文〉「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對於人所生存的百年，眾人都珍視而不捨，害怕沒有成就，而眷戀愛惜每一日每一時。「存為世珍，沒亦

³¹ 元·陳秀民，《東坡文談錄》，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刊集成》，1969年，頁19。

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希望活著的時候被世人重視，去世了也能讓人懷念。當「存」與「沒」相對時，陶潛自許特立獨行，與世人不同，不以獲致他人之褒揚，作為自己存在的目標。不以世人的價值觀念，作為自我生活的目的。無論儒家或道家，都相信「人」有與生俱來的善性，是異於禽獸的價值根源。如果價值觀念是外在的，將隨社會的變化而與世沉浮，淪為物役，而失去自我的自由。即使陶淵明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懷抱遠大的志向，與其說他曾經眷戀功成名就，不如說他曾經懷抱入世的思想，想要實現遠大的抱負，因此功名不是他人生的最終目標，所以能從容地在黑暗的政局中拔身。在自祭文中，陶淵明說出了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判準，顯然他對「實現理想」和「爭名奪利」劃分的十分清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代文人與帝王間「知遇」的交互相應是很重要的，劉備（161年—223年）能「三顧茅廬，言聽計從」，所以諸葛亮（181年—234年）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報其知遇之恩。如果生不逢時，而又想堅持自己的理想，那只要二個選擇：走上屈原的道路，不惜燃盡生命所有的火花，或者選擇陶淵明的方式，寄託精神於田園山水，融入大自然的造化。

「寵非己榮，涅豈吾緇」即「榮寵非己，涅緇豈吾」，受到世人的揄揚或得到顯達富貴不是目標，與世浮沉卻是所能、所願。陶潛寧可昂首傲立於簡陋的房舍，痛快喝酒，作詩。〈五柳先生傳〉：「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分窮，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我們看到了他始終如一的人生態度。「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了解自己註定的氣數，知悉自己生命的極限，啊！能不眷戀嗎？知道自己生命將盡，有誰不眷戀的呢？但是我現在就這樣死去，卻能夠無所怨恨。陶淵明留下一個懸疑，有哪個人面臨死亡而不眷戀，是什麼人生態度，可以讓人從容赴死？解答即是「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陶淵明六十三歲，可謂高壽，而譬之以「百齡」，夸飾其長壽。在戰亂頻仍，朝代更迭，天災人禍的年代逃得過政客迫害，盜賊殺害，以帶病之身，苟延殘喘而到六十三歲，還有什麼遺憾？能夠順隨心意，實現隱居田野的理想，任隨自然的安排，與之同化，生于斯而死于斯，還有什麼好遺憾。能活到高歲，置身於渴望的隱望生活，而得以壽終正寢，不死於非命，還有什麼好眷戀。明·張自烈（1597年—1673年）：「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亦當捐軀，必希苟免。且有曠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真能認取故我。」³²自是陶潛的知音。《論語·述而篇》：「子貢曰：

³² 同註16，頁468。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³³言下富足的自足與自豪，在〈自祭文〉中重生「求仁」而再現「得仁」了。張自烈：「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言非淵明不能道。」³⁴ 可敬的，正是陶淵明面對橫逆時所採取的價值取向，他的生命軌跡，始終如一而又無怨無悔。

張岱〈自撰墓誌銘〉自評一生有七不可解，實則闡其面對明亡的遽變，所遭蒙的巨大震盪，而以七命題自嘲自解。並於其中悔恨以了悟，或於其中挺立以應對。例如：「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往昔以韋帶布衣而兼享紈綺子弟的豪奢逸樂，可上比於公侯，如今卻以世代官宦之身，淪為無籍之乞兒。余德余（1943年—）引《瑯嬛文集》曰：「幾個兒子都不善營生，以致『山廚常斷炊，一日兩接浙』。『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骨瘦如雞肋』的張岱此年已是五十八歲，迫於生計，還得親自參加舂米、擔糞的勞動。」³⁵在一不可解中，亡國遺恨不絕，貴賤身分差池，身為遺民而能守忠愍安鄙賤，雖自唾於昔時荒逸，也自解於恥食滿粟，身道與國運同起落。「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明亡前產業比不上中等之家，卻目濡目染於侈靡以相高，明亡後雖有多種便捷途徑，卻安身立命於隱居生活，所謂貧富之論定，豈真以物質生活之奢寡為標準，國家的覆亡，使張岱心中對於生活的價值，產生不同的觀點，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同飛升而同迫降了。

「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國難在前，當效漢代投筆從戎之班超，從軍衛國以建功績；社稷蒙塵，則國之將軍也要以筆墨實踐未竟之業。所謂文武之能，必當勇赴民族之存亡。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明末清初文人學者的心中，救亡圖存的責任感，風湧號召了當代的鬥士，例如：崇禎十六年成為國子監生的顧炎武，在清兵入關後，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撰有《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清軍攻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終身不事清。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以死堅拒推薦。顧炎武既以書生踐戎馬，又以將軍翻文府。以上總三不可解，寫張岱所經歷的最大的慘痛，所悟得的最寶貴的價值經驗。

「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在神明之前無諂諛的必要，與悲田院乞兒相處而不驕矜，有德者豈能因對象不同而諂

³³ 《廣解四書·論語·學而篇》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臺北：東華書局印行，頁74。

³⁴ 同註32。

³⁵ 同註27，頁41。

媚、而驕橫。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³⁶更何況人之尊卑，豈是「處貧」或「居富」可論斷。尚繼武：「他心懷入世抱負，但年輕時家國尚在卻生逢國運敗落，有抱負而無所用；國破家亡純粹避世，卻內心有所不甘。」³⁷「能力」與「機運」隸屬於兩個不同的命題。張岱一生折挫於科場，尚不至於依附攀慕，反而寫出反抗八股箝制的文章，如《石匱書·科目志》：「有人於此，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腐。」³⁸四十八歲餘蔭盡後，落拓失憑，如〈舂米〉所言：「身任杵臼勞，百杵兩歇息」、「自恨少年時杵臼全不識。因念犬馬齒，今年六十七。在世為廢人，賃舂非吾職。」³⁹勞於田壤，露膚沾肌，乃至受〈擔糞〉所苦：「近日理園蔬，大為糞所困。」、「婢僕無一人，擔糞固其分。」、「扛扶力不加，進咫還退寸。」⁴⁰今昔不啻天壤，恍如隔世，況比於悲田院乞兒，又何所驕。但是年少的荒玩不恭，又豈是老壯的撰述不輟可比，所謂「尊」與「卑」又何可判而以為然。

「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可忍有不可忍。因為堅持還原歷史的真相，忍受清廷的血腥鎮壓，致力於明史的編纂，而且「事必求真，語務必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⁴¹立下與《石匱書》共存亡的決定。一個紈袴出身之人，竟然忍受長期的高壓脅迫與斷炊缺糧，其中必須承擔的尊嚴挫傷，又豈只唾面自乾可比。而仗義直言的刀筆，寫下〈姚長子墓誌銘〉、〈周宛委墓誌銘〉、〈古今義烈傳〉，在文字的馳騁攻略中，揮兵於倭寇、揭竿於科舉，擎旗於民族大義，當然可比於單騎赴敵。「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無論前半生或後半輩子，鐘鳴鼎食式的萬般逸樂，或捉襟見肘式的簞瓢屢空，爭論於名利的，或計算於嬉鬧娛樂的，都非所急迫。這是異於常人，且非常人所能的行徑。表現張岱有所取有所不取的選擇，雖然無法在明末汙濁的政治中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但著書立說，卻實現了著作等身的功業。

「博弈搏菹，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是能辨澆、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張岱廣於材藝，雖有紙醉金迷、伎弦管玩之失，但卻富厚了他的藝術生命。習

³⁶ 同註33，頁10。

³⁷ 同註12，頁207。

³⁸ 明·張岱，《石匱書·科目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卷廿七，頁2。

³⁹ 同註23，頁36。

⁴⁰ 同註23，頁35。

⁴¹ 同註23，頁100。

琴如《陶庵夢憶·過劍門》所載：「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⁴²磁陶銅青，精搜細羅，如〈附傳〉所言：「所遺尊、卣彝、名畫、法錦，以千計。」⁴³藝術的鑑賞生活，使張岱靈敏於別具巧思，涵養於雅致情韻，使他在文章當中，標舉主體精神的觀照，深切生活體驗的真味。《幼學瓊林·地輿》：「淄澠之滋味可辨，涇渭之清濁當分。」⁴⁴《呂氏春秋·精諭》：「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⁴⁵張岱的文理思致流動於事物中，演繹為生活的情趣，耳目所接皆成風情之樂。《陶庵夢憶》所舉的各項民俗遊藝，琴棋蹴鞠，戲曲廟會，觀荷賞月，鬥雞賽舟，校獵演武等等，琳琅滿目，應接不暇。如張則桐所言：「張岱是一位造詣精深的生活藝術家，人生藝術化的觀念貫穿了他的一生。晚年雖然在貧困窘迫的物質生活中，我們仍能從他的詩文中感受到新鮮的藝術情趣。」⁴⁶而《陶庵夢憶》是張岱藝術化人生的結晶。茶淫橘虐的生活，豐厚了張岱的品味，包括美食茶道、器皿古玩，在文藝創作中，深刻於風姿神韻，在精選細擇中，表現出靈動的世俗歡惡，舉筆點染自成樂趣。這自然不屬於奪長搏短的意氣之爭，也當不是汨沒於物流者所迷失。

張岱以七不可解，自解命運中所遭逢的課題，一切的體悟都來自於「人生無常」。「貴賤、貧富、尊卑」上下易位，「文武之能」被重新評價，「寬猛緩急之度」被重新擇選，以至於愚智之辨，得失之權衡，都被重新咀嚼。這一段文字夾雜家國覆沒之恨，愁鬱自解之願，有悔有悟，既自我嘲諷又自我肯定，並且寓褒於貶，而最後終究完成了人生的省思歷程。

三、擺盪之錘的休止符——蓋棺論定的自我觀照

蘇軾在〈縱筆三首〉其三：「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隻雞斗酒定贖吾。」⁴⁷虛待於日與月之間是雞與酒的等候，普天下砥節守忠者，能料到此窮途末路嗎？陶淵明《雜詩》：「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⁴⁸但是回報他的遠大志向者，卻是權貴操持的庸腐官場。能逃離「舉世皆濁我獨

⁴² 同註25，頁149-150。

⁴³ 同註23，頁216。

⁴⁴ 明·程登吉，《幼學故事瓊林》程允升原本，鄒聖脈增補，謝梅林、鄒可庭參訂，臺南：成大書局編輯部，1988年7月3版，頁15。

⁴⁵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審應覽第六·凡入篇第十八》高誘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月3版，頁497。

⁴⁶ 張則桐，〈從人生取向看張岱的價值觀念〉，《古今藝文》第三十一卷一期，頁45。

⁴⁷ 同註15，頁2328。

⁴⁸ 東晉·陶潛，《陶淵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10月）頁52。

清」⁴⁹者，唯有返璞歸真於自然。直到寫作〈自祭文〉的當下：「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逾邁是時間的消逝，生命終究必須走至終點，生存與死亡既然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所以姻親摯友晨宵來奔。陶淵明以走向歸途者之心，想像死去後親友的倉皇奔走，對比於自己面對死亡的從容，筆墨略帶滑稽。此等滑稽更加添作者面對死亡的自在。「倉皇」由晨宵來奔可見。「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一句，「蕭蕭」呼應首段「風氣蕭索」，借秋之肅殺，暗喻生命終了與枯萎。陶潛說：埋葬我於荒野之中，使我魂魄安息，有別於生者，我這一趟幽深沉寂的冥途，將入蕭索秋風吹拂的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即「恥宋臣奢，笑王孫儉。」，關於葬禮的安排，我羞如宋司馬桓魋的浪費，且嘲諷漢楊王孫的薄吝。無論浮靡奢華與節省薄吝都有過「過之」、「不及」之處，都失去悼亡的真諦。「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當空虛失落的感覺消逝，悲慨之情也會漸次遠離。不會再有人到墳上來聚土種樹，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薄葬的苛吝，厚葬的靡費，將無益於安定死者飄浮的魂魄，無用於宣洩存者潰決的傾訴，隨時日之遠去，痛失之情淡漠，也不再時時弔念於墳前。既然如此，又何必計較於厚薄，俗人自擾罷了。順乎人情，盡乎心意就好了，既然如此，又何必窮盡有生，汲汲奔走於鑽營。

「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嗚呼哀哉！」我既然已不重視生前的虛名，又怎麼會注重死後的歌功頌德。人生在世實在艱辛，死又有什麼關係呢？嗚呼哀哉！為什麼世人總是想不透，而有那麼多的牽掛與不捨呢？前後兩個「嗚呼哀哉」：第一個表達生離死別之痛，人情所難免，陶淵明也為之嘆息。第二個表達名利毀譽之追逐，終生難已，死後都將落空，世人為何淺薄而不能通達。在行將就木之際，〈自祭文〉中還不失幽默的，為世人一發扼腕之嘆。充份表現了從容不迫的態度。

張岱在〈自撰墓誌銘〉中自我論定：「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總結一生，張岱可說是富貴人，無論前半生浸淫藝術玩賞的頹廢，或後半生筆耕著作等身的績業。也可以說是貧賤人，無論明亡前的孤芳自賞，遠離功成名就的追求，或明亡後的破敗流離，悔恨摻半的自咎與自責，兼以擔糞自虐求生的困苦。「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也可以說張岱具有智慧，否則怎麼能擁有跨越各領域的筆墨傳世，張則桐：「勤奮著書是張岱的價值觀念在生活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從二十七歲編成《徐文長逸稿》開始，他手中的筆一直沒有停止，去世之前還在為《越人三不朽圖贊》的刊印忙碌。張岱的著述涉及史學、經學、文學、類書等各個領域，幾乎包括了

⁴⁹ 同註1，頁477。

明清之際文藝學術的所有領域，其中史學和文學的成就尤其突出。他以宏富的著述樹立了明末清初思想文化大家的地位。」⁵⁰句括《夜帆船》在內，從存明史到百科全書，包羅萬象，從充沛活躍的筆觸，能見其不為困窘所苦的自在與自得。但是如果以不務功利的冬烘，也可稱之為不識時務的愚笨人。「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在艱困中，賴農耕以為生，尚且勇於實現理想，可以說是一個堅強的勇者。在亡國後，沒有選擇以身就義，也可以被罵為軟弱的人。「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說他躁急或懶散都可以，反正他不在乎。「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這一生的多才多藝，舉凡文人學者所沾染浸潤者，雖不能成就一家之學，但書法舞劍之術，節義文章之能，求仙成佛之思，務於農圃之勞，莫不經歷。任憑世俗人以敗家子，頹廢者，頑冥人、鈍秀才，瞌睡漢，甚或死老妖來稱呼他！檢點之下，他無愧此生，冥冥黃泉路，行之可也。

四、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的寫作特色

（一）傷春悲秋，潛藏遺憾

陸機（261年—303年）〈文賦〉：「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⁵¹本文陶淵明以秋景發端，既寫實於時序，也特別能誘發秋景蕭條的悲涼氣氛，特別能烘托行將就木之人的傷痛感懷，以及一個人即將死亡的特定情境。自楚辭以來，悲秋的文學傳統，以蕭條的秋景寄寓傷感。楚辭〈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⁵²將迎神之巫不見神靈的落寞、惆悵之情，融於洞庭湖的波風落葉聲中，愈發顯得淒清和悲涼。暗示：神明未來，來的只有蕭索的落葉，憑添傷感。「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本文中「逆旅之館」、「本宅」比喻人世，生只是暫時的借居，死才是本來的歸宿。《列子·天瑞篇》：「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⁵³陶淵明〈雜詩〉：「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⁵⁴大雁南飛而去，草木枯黃凋零，陶子將要辭別人世，永遠回歸於舊宅。「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以冥，聆

⁵⁰ 同註46，頁48。

⁵¹ 同註4，頁245。

⁵² 同註1，頁141。

⁵³ 戰國·列子，《列子》張湛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9月）頁11。

⁵⁴ 同註48，頁53。

音愈漠。嗚呼哀哉！」推想老朋友淒涼的以悲傷的態度相對，齊聚在今晚為我設宴逆行，獻上嘉肴，呈上美酒。生離死別是人生大事，悲痛與不捨是人之常情，就算是視死如歸，有大去的心理準備，但這些熟知的面容，這些熟悉的語音也將漸次遠離模糊消逝，怎不令人悲傷呢？「陶公本性嫌無病呻吟，而其祚莫不有物，乃自感覺身體之衰微，如西山殘日，秋圃荒枝，藉〈挽歌〉、〈自祭文〉之文以敘人生觀。」⁵⁵

（二）似貶而褒，正言若反

在回顧之作中，張岱作了自我觀照的省思，以多重角色自嘲。「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舉富貴、貧賤對稱，一方面表示陷於墜落的局勢中，身份地位丕變，可以見其倉皇的面貌。一方面表現屈於山野的乏困中，守節著述，可以見其操守的堅定。「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舉智慧、愚蠢對稱，一方面以得失不在於擲骰子、下棋等遊戲上，而在深切體會對生命所造就的滋補，一方面標榜自我靈動之心，對於遍嘗甘苦的主宰性。「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舉強項、柔弱對稱，一方面揭示強弱不能就表象論定，而在當爭與不當爭的價值判準。處清劣境之中，唾面自乾又如何，韓信尚且受跨下之辱。當為所當為時，則將義不容辭，躍馬干戈以之，張岱曰：「余故不能為史，而不得不為其所不能為，固無所辭罪。然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⁵⁶在文字箝制的高壓中，猶堅持著述《石匱書》。「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舉卞急、懶散對稱，表示不汲汲於世道的競名逐利錙銖必較，《離騷》：「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頤亦何傷？」⁵⁷張岱所顛頤、急切者自是千載文人脩名脩德、著書立說的大功大業。「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舉「書劍節義文章仙佛農圃」為範疇，指前半生承自晚明，狂狷不羈玩物玩世的放任所成就，藝廣多方，雖未能建立一家之說，但卻無所不涉。後半生投棄荒遐，飽受手足胼胝之苦，也練就挑糞力杵農圃之技。內容寓褒於貶，正言若反，淚眼中夾雜自得，歷數經歷，無限滄桑。「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張岱自許絕不坐困於「患人之不己知」的憂慮之中。這種自信不正是《論語·憲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⁵⁸充分表達了操之在我的自我肯定。

⁵⁵ 清·鄭文焯注，《陶集鄭批錄》卷三，[日]橋川時雄補校，文字同盟社，1927年，頁51。

⁵⁶ 同註23，頁100。

⁵⁷ 同註1，頁22。

⁵⁸ 同註33，頁154。

（三）以生悼死，對比與想像一起奔放

陶淵明在祭文中想像了臨終送別的场景，「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以冥，聆音愈漠。」對於生命的凋零，有一種置身事外的輕鬆，對於黃泉之途，有視死如歸的從容，「嘉蔬清酌」在前，如同一生所追求的平靜與樸實，生命的真味也當在清茶與淡飯之中。人生而如此，所以祭亦當如是，所怡然而自適者，解脫腐臭政治所夾帶的腥肉躁魚，將離世的軀殼無所罣礙。「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對比人我的緩急，無須議價得失。對於有限生命的對待方式，有更多的解放與鬆綁，完全脫去世事顛沛的滋擾，表現平實而豐富的生命內涵，用語簡樸、優美，不加矯飾。「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想像親友故舊，聞訊惶惶，倉促疾走。但是終究要遠離的，也只有自己的魂魄。以生悼死，情感雖平淡沖和，但是表情瀟灑，態度曠達。

（四）以死念生，感性與懷恩振臂相擁

張岱在自撰之作中，將行仍感念親恩，對於尊長憐愛培育之心，慨然回首，沒世難忘，「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宦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簍，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裸抱提攜的恩情，暖日照拂的慈輝，暄妍了篇章，也光迴照返了熒熒燭炬，能見菊老荷枯的淚水滌盡一生的塵僕，做懷恩遠行的準備。「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為錢塘遊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塘縣裡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余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感恩懷德中，猶有老驥伏櫪的悲鳴，有忝所譽的慨嘆，直到當下仍有責任未了的遺憾。他的《自撰墓誌銘》通篇文字精煉而暢達，串貫喻托，排比成諷，對比奢靡與貧窶，痛陳亡國之恨。所涉命題無不莊嚴凝重，然而乞兒與玉帝成文，唾面與遊戲成詞，以詼諧調謔，寄寓嚴肅的獨白。自陳癖嗜，非祭文「隱惡揚善」之常法，但是對比於「著作等身」，又有志拔能超之卓絕。有懷慕、有悔恨，有自責、有自強，多重對立的情感，成為張岱豐富的人生經歷的最佳寫照。

伍、結語

雖然面臨死生之大限，但無張惶之憔悴。料定必然，所以從容以之。因此，有更多冷靜的時間，做自我獨白的檢視。回溯高風張帆的險境，或泥船渡河的窒礙，消融在歲月的灰燼中，瀝血猶帶腥臊的痛，滋育灰燼，成為宏富生命內涵的動力，在自為之作中散發光亮，成為不朽。張岱在墓誌銘言：「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舉了王績、陶潛、徐渭等人之作。正因為這些作品，在時窮困躓中，表情真摯，率真於自我獨白的觀照，具有生動的感動力。影響所及，張岱效顰之作也突出優異，尚繼武曰評之：「其文文筆跳宕峭快，時而沉著鬱憤，時而輕靈明快，時而貌莊令人深思，時而詼諧催人反省，在歷代自題墓誌銘文叢中，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思想內容，折射出張岱曲折多難的人生經歷，和卓然持異的文化人格。」⁵⁹自撰墓誌銘的體裁，從漢哀帝杜鄴起，到張岱的自撰之作，可以說是出類拔萃。葛洪（284年—363年）《西京雜記》：所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晏息。』及死后，命刊石，埋於墓側。」⁶⁰簡陳事略，僅供後人按碑稽考。到了陶淵明，一反〈薤露〉、〈蒿里〉的恐懼和憂傷，表達面對生死的坦然，對曲終人去的讚禮，帶陶式的幽默口吻，勘破形體與精神的真正自由，自是一大特色。包括王績的自撰之作，不寫世系，甚至於日地不在陳述臧否，也不細數功蹟，全然是抒發自我的情調，自我獨白的口吻，對於祭文寫作形式的解放，亡者真切自我的表白，有別於形式的堆疊，有別於他撰墓誌銘，涵詠豐富自我追悼之情。

唐代的自撰之作，裴度（765年—839年）只留「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為臣之道，備乎國史。」⁶¹片語隻辭。而顏真卿（709年—785年）因平亂而遭害，雖然有墓誌之作，沒有傳世。韓昶（？—855年）自為之作，自陳世系及己所傳，布陳細瑣，「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語。因與俗乖，不得官。」偶發牢騷，以銘文略表個人的蹉跎，平凡無奇。銘文：「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為賢，而白黑分。眾以委委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雖然一吐不遇之痛，但是敘述空存憂惱，而並不深刻。杜牧（803年—852年）《自撰墓誌銘》大量記述祖考與官歷，並涉夜夢、星象、甌裂等事以為死亡之兆，不同於一般自省自悔自

⁵⁹ 同註12，頁206。

⁶⁰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12月），頁38。

⁶¹ 宋·王讜，《唐語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6月，卷二，頁十一，總頁60。

悟自得之作，無法呈現個人自我評價的觀點。無如袁枚（1716年—1797年）自輓詩：「人生如客耳，有來必有去。其來既無端，其去亦無故。但其臨去時，各有一條路。…逝者如斯夫，水流花王住。但願著翅飛，豈肯回頭顧？偉哉造化爐，洪鈞大鼓鑄。我學不祥金，躍治自號呼。作速海風迎，仙龕陪白傅。或遊天外天，目睹所未睹。勿再入輪迴，依舊詩人作。」⁶²寫得暢快淋漓，如同曹操（155年—220年）的〈善哉行〉裡所說：「人生如寄，多憂何為？」瀝乾憂慮後，袁枚也能敞懷邀請大家為其生輓，無論得到的是揶揄，或是嘲諷，或是真情挽留，或是曠達一嘆，坦然如此，竟讓他多活了好幾年，直到八十二歲才仙逝。

張岱自撰之作，抱存「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⁶³儒家聖賢立德立言立行的訓誨，發酵發光發熱，成為張岱自我價值判斷的根本，他自嘲：「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⁶⁴蘸饑為筆，悔悟故國如夢。不可自解的排比相對，造就譏諷，以詼諧相戲謔，但是所彰顯的氣節崇高，情操偉偉，態度莊嚴而蘊情深厚。相較於五十歲以前遊戲人生的態度，深刻的表達臨老悲壯的情懷，令人動容。陶潛以悟透自解之心貫串了自祭的文字，放下世事的銀鐺囚錮，自放於天地之間，與張岱成為文學上儒道自為之作的雙璧。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廣解四書》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東華書局印行，1961年。
 戰國·屈原，《楚辭注釋》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殷光熹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6月大陸初版，1993年9月臺灣初版。
 戰國·列子，《列子》張湛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9月。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高誘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月3版。
 戰國·莊子，《莊子·大宗師》，陳鼓應註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六版。
 漢·司馬遷，《史記》，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鼎文書局，1977年。

⁶²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1988年1版，2009年4月翻刷，頁823。

⁶³ 同註23，頁111。

⁶⁴ 同註23，頁110。

- 漢·戴德、戴聖漢·戴德、戴聖，《十三經注疏》八，《禮記疏卷》鄭沅注，孔穎達疏，據嘉慶20年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
- 東晉·陶潛，《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 東晉·陶潛，《陶淵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10月。
- 東晉·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據陶文毅集注本，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12月。
- 《兩漢魏晉十一家文集·揚雄》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5月，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3版。
- 南朝梁·蕭統，《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9月6版。
- 南朝梁·蕭統，《文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 唐·王績，《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6月。
- 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冊二，《四部備要》據東雅堂本，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3月1版。
-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序傳》清·浦起龍釋，白王崢校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 宋·王讜，《唐語林》，臺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6月。
- 宋·蘇軾，《蘇軾詩集》，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 元·陳秀民，《東坡文談錄》，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刊集成》，1969年。
- 明·吳訥、徐師曾合著，《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 明·程登吉，《幼學故事瓊林》程允升原本，鄒聖脈增補，謝梅林、鄒可庭參訂，臺南：成大書局編輯部，1988年7月3版。
- 明·張岱，《張岱詩文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明·張岱，《石匱書·科目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 明·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尋夢》，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
- 明·徐渭，《徐文長三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臺北：偉文出版社，1976年。
- 清·汪汲著，《事物原會》，據清古愚出房藏本影印出版。揚州市：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二書庫A區，R 041 131。請洽一樓出納組調閱館藏。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1988年1版，2009年4月再版。
- 清·鄭文焯注，《陶集鄭批錄》，[日]橋川時雄補校，文字同盟社，1927年。

二、近人著作

- 川合康三著，《中國的自傳文學》蔡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6月。
- 余德余，〈甘灑熱血存「春秋」—張岱〈自為墓誌銘〉現象窺探〉，2004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4卷第3期，頁40-44。
- 尚繼武，〈自為墓志寫心曲-張岱的特異文化人格探窺〉《前沿》，2005年，第5期，頁206—209。
- 張則桐，〈從人生取向看張岱的價值觀念〉，《古今藝文》第三十一卷一期，頁44-49。
- 劉繼才，〈王績與陶淵明比較論〉，《江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頁69-80。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七期；83-104頁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1年12月

文人的自我獨白 ——解析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

郭乃禎*

【 摘 要 】

歷史上第一個以自傳式的寫作方式為自己發聲者，起源於屈原的〈離騷〉，〈離騷〉一開始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在這一篇歷史長詩當中，屈原自敘世胄、生辰與命名，飛揚於人生的理想，哀痛仆踣於信讒齟齬，乃至執著於再三追尋，以死為諫的忠烈悲慨，已為文人自我獨白的寫作方式，寫下畫時代的里程碑。而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體式，寫於死生大限之期，真情流露，對於筆耕一生的文者，當具有回顧自省、褒貶評價的意義，或得、或失，或憾，或否，文人如何為自己蓋棺論定，必有可觀之作，本文將取陶淵明〈自祭文〉、張岱〈自為墓誌銘〉解析之，推究其內涵、價值、特色與成果，並兼及歷代自祭自撰墓誌銘之作。

關鍵詞：自祭、自撰墓誌銘、張岱、陶淵明、生死之作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講師

Literati's Monologues: Analysis of Self Obituary and Self Written Epitaph

Guo, Nai-Zhen*

Abstract

Li Sao (離騷) was the first autobiographical ode written by Chu Yuan (屈原)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ode, Chu Yuan describ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date of birth and the reference of his name. The writer also expressed his aspiration but lamented for his frust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king's ignorance and scorn. The whole piece of writ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a literatus' monologue. Self obituary/epitaph, on the other hand, was an anomalous form of autobiography, which was derived from the monologue style of *Li Sao*. As a literatus, the writer made a final judgment on himself. When retrospectively to his whole life, the writer had a self-reflection on his merits. There might be recognition, achievement, critique, regret, gain and loss. This article takes *Self Obituary* (自祭文) authored by Tao Yuan-Ming (陶淵明) and *Self Written Epitaph* (自為墓誌銘) authored by Zhang Dai (張岱) as examples, and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ir meanings, literary values,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this writing style.

Keywords: self obituary, self written epitaph, Zhang Dai, Tao Yuan-Ming, a writing of life and death

*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歷史上第一個以自傳式的寫作方式為自己發聲者，起源於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離騷〉，〈離騷〉一開始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¹在這一篇文章長詩當中，屈原自敘世胄、生辰與命名，飛揚於人生的理想，哀痛仆踣於信讒齟齬，乃至執著於再三追尋，以死為諫的忠烈悲慨，已為文人自我獨白的寫作方式，寫下劃時代的里程碑。《史通通釋》：「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迹，實基於此。」²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以孔子發端，說明紹承著述的原委：繼承父命，以編纂為世職，是孝子的表現；尊尚朝廷，以推崇之心論著，是忠臣的表現也；宗主孔子，依傍於《春秋》而筆法之，是史家之所當為。並且論及先祖、父親典事於史、以及遊學述職志意所趨向，雖然是《史記》一書的創作始末，但又具有自傳的特質。《史通通釋》：「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³〈與楊德祖書〉：「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⁴曹植（192年—232年）意氣鋒發的筆端，舒展了生命的藍圖，同樣是自我價值的剖判。

包括揚雄（前53年—18年）〈逐貧〉之賦，韓愈（768年—824年）〈送窮〉之文，或是「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⁵之苦，或是「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⁶之所煎迫，何嘗不是文人自剖式的獨白。而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體式，

¹ 戰國·屈原，《楚辭注釋》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殷光熹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6月大陸初版，1993年9月臺灣初版，頁7。

²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序傳》清·浦起龍釋，白王崢校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256。

³ 同註2，頁257。

⁴ 南朝梁·蕭統，《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9月6版，頁604。

⁵ 《兩漢魏晉十一家文集·揚雄》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5月，頁16。

⁶ 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冊二，《四部備要》據東雅堂本，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3月1版，卷卅六，頁3。〈送窮文〉：「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行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寫於死生大限之期，莫不直言吐實，真情流露，對於筆耕一生的文者，雖終其一生悠遊於筆墨之趣，所言萬端，無所不吐。但是祭銘之作，更當具有回顧自省、褒貶評價的意義，或得、或失，或憾，或否，文人如何為自己蓋棺論定，必有可觀之作，本文將取陶淵明（約365年—427年）〈自祭文〉、張岱（1597年—1679年）〈自為墓誌銘〉解析之，並兼及歷代自祭自撰墓誌銘之作。

貳、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由來及特色

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屬於祭弔類和碑銘類的文體，《文心雕龍·哀弔卅》：「弔，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⁷祭弔類的文字為弔喪之賓到來，以言辭悼慰亡者在天之靈。詹鍇（1916—1998），曰：「弔文之作，往往是對古人致追慕、追悼或追慰之意。對於死者，或悲其有志而不成功，或傷其懷才而不見用，或怪其狂簡而遭累，或惜其忠誠而殞身。以惻剴切，使讀者能明是非，辨邪正為目的。」⁸因此祭文多兼有志意未竟，懷才不遇之悲，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之痛，賈誼（前200年—前168年）〈祭屈原文〉之「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⁹備考亡者生前之事，而以清新的文辭表達哀傷，可說是古今祭弔之文的典範。

墓誌銘的體裁特色，如明·徐師曾(1546-1610)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¹⁰《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¹¹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古時銘刻於器，如鼎銘，盤銘。秦、漢以後，或刻於石，如班固（32年—92年）〈封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一般稱為碑銘。墓誌是碑銘的一種，存放於墓中。記載死者生平功業，是個人歷史的濃縮，寫作墓誌銘者，乃立德、立言、立行，為亡者留名。尚繼武(1970-)：「現考最早的自題墓誌銘是漢哀帝時馮州

⁷ 南朝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3版，頁475。

⁸ 同註7，頁478。

⁹ 同註7，頁479。

¹⁰ 明·吳訥、徐師曾合著，《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頁148。

¹¹ 漢·戴德、戴聖，《十三經注疏》八，《禮記疏卷》鄭沅注，孔穎達疏，據嘉慶20年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卷四十九，頁十八，頁838。

刺史杜鄴為自己撰寫的。葛洪《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歸於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晏息。」』¹²，而文人自撰墓誌銘則以唐王績為始。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志者以散文記敘死者姓名、籍貫、官級、功蹟。銘者以韻文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

貞觀十八年，王績（585年—644年）病逝家中，其自撰墓誌銘曰：「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¹³通篇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為文眼，以莊子思想「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潰潰癰」¹⁴為基調。「有道」者，追慕陶潛真率疏放，曠懷高致之風，行己有道。「無功」者，對隋末唐初天下動盪、政治鬥爭激烈表達不滿，一生無所作為。王績仿陶潛〈自祭文〉，作〈自作墓志文〉，仿〈五柳先生傳〉，作〈五斗先生傳〉，仿〈桃花源記〉，作〈醉鄉記〉。在〈醉鄉記〉記中，虛擬醉鄉「去中國不知幾千里」，處境幽美，得以安居，可以說是陶潛的忠誠追隨者。自唐而後，文人自撰墓誌之作源源不絕。例如：嚴挺之、顏真卿、裴度、韓昶、杜牧、徐渭、張岱等等，皆有自撰墓志之作。

參、創作背景—生死有期與顛躓窘困的交相煎迫

宋徽宗即位，蘇東坡（1037年—1101年），年屆六十六，從儋州北歸，途經金山寺，寫下《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一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¹⁵成為回顧人生歷程的喟嘆。面對人命奄乎有時而盡的窘迫，與世事輾轉壘礙交切的橫逆，誰能無痛呢！陶淵明出生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長沙郡公。祖父陶茂作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任安成太守，早逝，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陶淵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及彭澤縣令等職，後「不為五鬥米折腰」，辭官回家。行年五十初患瘡病〈與子儼等疏〉：「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¹⁶已有臨終遺言之口吻，直至寫自祭文六十三歲，可謂宿疾纏身，貧病交迫。據《宋書·隱逸傳》所考證，陶淵明死於南朝宋元嘉四年九月，由於疾病的折磨，生命的日漸衰損，使他

¹² 尚繼武，〈自為墓志寫心曲—張岱的特異文化人格探窺〉《前沿》，2005年，第5期，頁206—209。

¹³ 唐·王績，《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6月）頁310。

¹⁴ 戰國·莊子，《莊子·大宗師》，陳鼓應註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6版，頁213。

¹⁵ 宋·蘇軾，《蘇軾詩集》下冊，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頁2641。

¹⁶ 東晉·陶潛，《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頁441~442。

耗盡生命力而視死如歸。他的〈挽歌詩〉：「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¹⁷自陳蕭條悲涼之景。〈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先寫年，再寫季節月份，寒意乍升而景色凋敝，寫於祭文之中，特別能感受生命暖度的消逝。大雁南飛遠去，觸發大去之遠行，一去不返的意象，而枯黃的草木也令人聯想到生命的凋零。雖豁達如陶潛，能對大去之期而無感乎！

徐渭（1521年—1593年）是明代晚期的書畫家、文學家、戲曲家，袁宏道（1568年—1610年）〈徐文長傳〉寫其「雅不與時調合」，「屢試屢蹶」，「不得志於有司」¹⁸，造就他成為一個懷才不遇的知識份子，滿懷狂放與悲憤，不惜以生命與世俗相抗衡。嘉靖四十三年胡宗憲（1512年—1565年）因「黨嚴嵩罪」入獄，並畏罪自盡，徐渭哀之，作〈十白賦〉。時胡宗憲案搜查甚嚴，徐渭深感危殆，作〈自為墓志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¹⁹傳世著述有《徐文長全集》、《徐文長佚稿》、《徐文長佚草》，劇本《四聲猿》、《歌代嘯》，嘉靖三十八年撰成戲曲理論著作《南詞敘錄》。書法有《青天歌卷》、《詠墨磁軸》、《題畫詩》，繪畫有《墨葡萄圖》、《山水人物花鳥》、《牡丹蕉石圖》、《墨花》等，所作遍及書畫曲文。因一生顛簸，妻與子俱違，孤高疏狂，袁宏道：「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²⁰其〈自為墓誌銘〉：「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裊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²¹一生受盡屢挫屢仆的折耗，仍保有「不浼袒裊」的樸真，屢臨死生的試煉，仍不免於忐忑，其銘曰：「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競系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啜涓，即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²²可以無死，可以無生，生死無常，或微服，或佯狂，如何做到有智慧而能明哲以保身呢？直到寫作銘文的此刻，徐渭深有受盡命運鞭撻的憂悵。

張岱處於明朝危急存亡之秋，目睹忠臣烈士以身殉國，以死明志，而〈陶庵夢憶序〉曰：「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駢駢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

¹⁷ 東晉·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據陶文毅集注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四，頁5。

¹⁸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一）》，臺北：偉文出版社，1976年）頁311~316。

¹⁹ 明·徐渭，《徐文長三集（四）》（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頁1549-1553。

²⁰ 同註18。

²¹ 同註19。

²² 同註21。

愕望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²³清兵入關，國破家亡，無法從容就義以表彰氣節的悲痛，啃蝕他的一生，張岱曰：「忠孝兩方，仰愧俯作。聚鐵如山，鑄一大錯。」²⁴在兵燹烽火的延燒中，日以繼夜地炙烙心靈的便是「忠義」二字。其〈自撰墓誌銘〉曰：「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生不逢時的悲慟流竄在時代中，無論陶潛、王績、蘇軾、徐渭、張岱無不遭難而惶惶，「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的蹙迫，讓他們寫下自祭與自撰墓誌銘的文字。因世事所侷限，人有「當為」而「不能為」的無奈，但是生於天地之間，卻能有「不與草木俱腐」的昂然，這是對自我「生」的價值的評判，有誰能放棄呢？

肆、自祭文與自為墓誌銘的內涵與價值

一、面對時運乖舛的態度—自我價值的剖判

張岱出生於書香門第，家學淵源。高祖天複，官至雲南按察副使，甘肅行太僕卿。曾祖張元汴狀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為萬曆進士，官至廣西參議。父張耀芳，副榜出身，為魯藩右長史。先輩均工詩文而有著述。張岱早年生活優渥，受到晚明崇尚性格，不拘禮俗以及狂放自由的影響。〈自撰墓誌銘〉曰：「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嬖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明亡後避居山野，所處困窘，以其博通經史，洽聞子集之能，著述不輟，墓誌銘曰：「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雖不能以身相搏成為義烈，而他回應時代的卻是「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俠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

墓誌文中張岱對於少時所浸潤的高情逸興，流連玩賞的諸般風月，既自負不凡，如同對故國的悔愧，又有自我批判的笞楚。《夢憶序》：「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

²³ 明·張岱，《張岱詩文集·瑯嬛文集卷之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0。

²⁴ 同註23，〈瑯嬛文集卷之五·蝶庵題像〉，頁332。

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²⁵對於遍及經史文集的文化事業，既有寫作《石匱書》「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²⁶的使命感，又有處困不屈，發憤著書的精神，使其風燭草露年屆垂暮，尚能聊以昂揚。余德余：「著《石匱書》就是『存國史』，『存國史』就是為了『存明』、『復明』。」²⁷所以墓誌銘末云：「曾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冢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雖有臨老之悲慨，出落於字句間尚有「取於項里」的自得，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²⁸余德余：「項羽是張岱崇敬的英雄，其當年反抗暴秦正和自己寄籬在清暴政下頑強抗爭可引為同調。」²⁹這是他面對乖舛所取的應對態度，也是他忍辱苟生，以保存國史的方式，抗爭到底的自我評價。

顏延年（384年—456年）〈陶徵士誄〉：「年在中身，疢維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³⁰既寫出陶淵明五十歲以後貧病交迫的現況，也寫出曠達灑脫以待天命的性格。陶淵明〈自祭文〉：「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上句傳達了生成為人的慶幸，下句表達了生而為人，卻生不逢時的乖舛。以「余為人」三字承上啟下，形成「幸」與「不幸」的落差。一般人面對這樣的狀況，大概會悲痛不能自己，會藉文意的起落表達懷才不遇的牢騷，特別是一個才華揚溢之人。但陶淵明卻是「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懷著喜樂到山谷打水，擔負柴薪時邊走邊唱歌，直至天色昏暗，才在暮色中，抵達從早候我到晚的家門。陶淵明表達了不悲不嘆，無怨無悔的豁達，掬取山谷之清泉，所得的豈僅僅是流水，還有來自大自然源源不絕的澄澈，山野清新的氣流，也足以淘洗他的心靈，成為真正豐潤生命的資源，若非如此，怎能忍受一生的侷促？必定是此中有真樂，有充沛滿盈的富足，讓他拋離了形骸上的不足。所以當他背負薪柴而肢體勞乏之餘，能夠長歌嘯野，成為一個快樂的樵夫。在早出晚歸、勞多獲少中返家，能以樸素簡陋的家門做為生命的依歸。離開了日暮的原野，回到家又敞開另一扇樸實，讓

²⁵ 明·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尋夢》，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9-20。

²⁶ 同註23，〈瑯嬛文集卷之一·石匱書自序〉，頁100。

²⁷ 余德余，〈甘灑熱血存「春秋」—張岱〈自為墓誌銘〉現象窺探〉，2004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4卷第3期，頁43。

²⁸ 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第七》，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300。

²⁹ 同註27，頁42。

³⁰ 南朝宋·顏延年，〈陶徵士誄〉，蕭統，《文選（六）》（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頁2469-2475。

這樣裡外通透的自由，陪伴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陶淵明的自祭文中，以簡短的「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四句縮影其田園生活，但是脫溢於文字的，卻是掩不住的快樂與滿足。

「含歡」與「谷汲」，「行歌」與「負薪」，「翳翳」與「柴門」都是對立的感受，每一句都有形骸上的勞苦，但也都賦予心靈上的喜樂，特別突顯了樂在其中的感受。前句「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寫日復一日，穿梭於原野自然的暇適自在，相形之下，所謂體膚之勞，更顯得微不足道。後句「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有迺繁。」寫年復一年，忙碌於田園農耕的陶然自得，所謂「耘耔」、「繁育」皆有兩面的解讀與表白。一則是艱辛的勞動與肉體的疲憊，一則是參讚大地生生不息的化育與成長。從字表上雖忙碌於耘耔繁育，所得到的卻是禾苗蓬勃的生機，由中可以體會出作者農耕生活的怡然自得。相對於為官領俸，耕作所獲更令人心安理得，陶淵明深耕細耨的，當不如是農田，還有他為自己所留下的那一畝自在的心田。

〈自祭文〉云：「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讀書以自愉樂，彈琴以相唱和。冬來則曝曬日下，享用天地給予的溫暖照拂，夏日則在冰涼的泉水中洗滌，享用澄淨無暇的清涼。本句鋪寫陶子的生活實況，特別能彰顯怡然自樂的充實度。以讀書汲取哲理，暢通於心靈思路，以古琴滋補聰明，優遊於清音雅樂。寒冬中自有暖日，炎夏中自有清泉，儘管生活總是夾雜嚴苛的考驗，但也蘊含無限的生機，特別是來自樂天知命的人，總能夠在嚴寒中看到晴日曝曬之溫暖，能夠在炙熱中浸潤通體涼徹的樂趣。生活中唾手可得的情致，不在用高價求索，而在靈通的體悟。「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辛勤勞動從來沒有停歇，而心裡卻常保有餘裕的自在空閑，樂於讓生命的步伐與自然的變化應節合拍，順隨本分，以窮其一生。

在陶淵明生於晉宋之際，群雄爭霸，政治腐朽的年代，儘管在大動蕩的年代中，有許多的追隨者，但是真能從積極濟世的抱負中隱退，順隨生命的節奏與步伐，走竟「清冽」且「樂至」的一生，當足以自得，而成為自撰祭文之由。自祭之作正如：東坡所言：「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曠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³¹

二、生命歷程的省思—悔與悟的選擇

陶淵明〈自祭文〉「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對於人所生存的百年，眾人都珍視而不捨，害怕沒有成就，而眷戀愛惜每一日每一時。「存為世珍，沒亦

³¹ 元·陳秀民，《東坡文談錄》，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刊集成》，1969年，頁19。

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希望活著的時候被世人重視，去世了也能讓人懷念。當「存」與「沒」相對時，陶潛自許特立獨行，與世人不同，不以獲致他人之褒揚，作為自己存在的目標。不以世人的價值觀念，作為自我生活的目的。無論儒家或道家，都相信「人」有與生俱來的善性，是異於禽獸的價值根源。如果價值觀念是外在的，將隨社會的變化而與世沉浮，淪為物役，而失去自我的自由。即使陶淵明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懷抱遠大的志向，與其說他曾經眷戀功成名就，不如說他曾經懷抱入世的思想，想要實現遠大的抱負，因此功名不是他人生的最終目標，所以能從容地在黑暗的政局中拔身。在自祭文中，陶淵明說出了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判準，顯然他對「實現理想」和「爭名奪利」劃分的十分清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代文人與帝王間「知遇」的交互相應是很重要的，劉備（161年—223年）能「三顧茅廬，言聽計從」，所以諸葛亮（181年—234年）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報其知遇之恩。如果生不逢時，而又想堅持自己的理想，那只要二個選擇：走上屈原的道路，不惜燃盡生命所有的火花，或者選擇陶淵明的方式，寄託精神於田園山水，融入大自然的造化。

「寵非己榮，涅豈吾緇」即「榮寵非己，涅緇豈吾」，受到世人的揄揚或得到顯達富貴不是目標，與世浮沉卻是所能、所願。陶潛寧可昂首傲立於簡陋的房舍，痛快喝酒，作詩。〈五柳先生傳〉：「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分窮，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我們看到了他始終如一的人生態度。「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了解自己註定的氣數，知悉自己生命的極限，啊！能不眷戀嗎？知道自己生命將盡，有誰不眷戀的呢？但是我現在就這樣死去，卻能夠無所怨恨。陶淵明留下一個懸疑，有哪個人面臨死亡而不眷戀，是什麼人生態度，可以讓人從容赴死？解答即是「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陶淵明六十三歲，可謂高壽，而譬之以「百齡」，夸飾其長壽。在戰亂頻仍，朝代更迭，天災人禍的年代逃得過政客迫害，盜賊殺害，以帶病之身，苟延殘喘而到六十三歲，還有什麼遺憾？能夠順隨心意，實現隱居田野的理想，任隨自然的安排，與之同化，生于斯而死于斯，還有什麼好遺憾。能活到高歲，置身於渴望的隱望生活，而得以壽終正寢，不死於非命，還有什麼好眷戀。明·張自烈（1597年—1673年）：「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亦當捐軀，必希苟免。且有曠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真能認取故我。」³²自是陶潛的知音。《論語·述而篇》：「子貢曰：

³² 同註16，頁468。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³³言下富足的自足與自豪，在〈自祭文〉中重生「求仁」而再現「得仁」了。張自烈：「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言非淵明不能道。」³⁴ 可敬的，正是陶淵明面對橫逆時所採取的價值取向，他的生命軌跡，始終如一而又無怨無悔。

張岱〈自撰墓誌銘〉自評一生有七不可解，實則闡其面對明亡的遽變，所遭蒙的巨大震盪，而以七命題自嘲自解。並於其中悔恨以了悟，或於其中挺立以應對。例如：「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往昔以韋帶布衣而兼享紈綺子弟的豪奢逸樂，可上比於公侯，如今卻以世代官宦之身，淪為無籍之乞兒。余德余（1943年—）引《瑯嬛文集》曰：「幾個兒子都不善營生，以致『山廚常斷炊，一日兩接浙』。『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骨瘦如雞肋』的張岱此年已是五十八歲，迫於生計，還得親自參加舂米、擔糞的勞動。」³⁵在一不可解中，亡國遺恨不絕，貴賤身分差池，身為遺民而能守忠愍安鄙賤，雖自唾於昔時荒逸，也自解於恥食滿粟，身道與國運同起落。「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明亡前產業比不上中等之家，卻目濡目染於侈靡以相高，明亡後雖有多種便捷途徑，卻安身立命於隱居生活，所謂貧富之論定，豈真以物質生活之奢寡為標準，國家的覆亡，使張岱心中對於生活的價值，產生不同的觀點，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同飛升而同迫降了。

「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國難在前，當效漢代投筆從戎之班超，從軍衛國以建功績；社稷蒙塵，則國之將軍也要以筆墨實踐未竟之業。所謂文武之能，必當勇赴民族之存亡。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明末清初文人學者的心中，救亡圖存的責任感，風湧號召了當代的鬥士，例如：崇禎十六年成為國子監生的顧炎武，在清兵入關後，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撰有《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清軍攻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終身不事清。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以死堅拒推薦。顧炎武既以書生踐戎馬，又以將軍翻文府。以上總三不可解，寫張岱所經歷的最大的慘痛，所悟得的最寶貴的價值經驗。

「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在神明之前無諂諛的必要，與悲田院乞兒相處而不驕矜，有德者豈能因對象不同而諂

³³ 《廣解四書·論語·學而篇》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臺北：東華書局印行，頁74。

³⁴ 同註32。

³⁵ 同註27，頁41。

媚、而驕橫。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³⁶更何況人之尊卑，豈是「處貧」或「居富」可論斷。尚繼武：「他心懷入世抱負，但年輕時家國尚在卻生逢國運敗落，有抱負而無所用；國破家亡純粹避世，卻內心有所不甘。」³⁷「能力」與「機運」隸屬於兩個不同的命題。張岱一生折挫於科場，尚不至於依附攀慕，反而寫出反抗八股箝制的文章，如《石匱書·科目志》：「有人於此，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腐。」³⁸四十八歲餘蔭盡後，落拓失憑，如〈舂米〉所言：「身任杵臼勞，百杵兩歇息」、「自恨少年時杵臼全不識。因念犬馬齒，今年六十七。在世為廢人，賃舂非吾職。」³⁹勞於田壤，露膚沾肌，乃至受〈擔糞〉所苦：「近日理園蔬，大為糞所困。」、「婢僕無一人，擔糞固其分。」、「扛扶力不加，進咫還退寸。」⁴⁰今昔不啻天壤，恍如隔世，況比於悲田院乞兒，又何所驕。但是年少的荒玩不恭，又豈是老壯的撰述不輟可比，所謂「尊」與「卑」又何可判而以為然。

「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可忍有不可忍。因為堅持還原歷史的真相，忍受清廷的血腥鎮壓，致力於明史的編纂，而且「事必求真，語務必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⁴¹立下與《石匱書》共存亡的決定。一個紈袴出身之人，竟然忍受長期的高壓脅迫與斷炊缺糧，其中必須承擔的尊嚴挫傷，又豈只唾面自乾可比。而仗義直言的刀筆，寫下〈姚長子墓誌銘〉、〈周宛委墓誌銘〉、〈古今義烈傳〉，在文字的馳騁攻略中，揮兵於倭寇、揭竿於科舉，擎旗於民族大義，當然可比於單騎赴敵。「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無論前半生或後半輩子，鐘鳴鼎食式的萬般逸樂，或捉襟見肘式的簞瓢屢空，爭論於名利的，或計算於嬉鬧娛樂的，都非所急迫。這是異於常人，且非常人所能的行徑。表現張岱有所取有所不取的選擇，雖然無法在明末汙濁的政治中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但著書立說，卻實現了著作等身的功業。

「博弈搏菹，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是能辨澆、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張岱廣於材藝，雖有紙醉金迷、伎弦管玩之失，但卻富厚了他的藝術生命。習

³⁶ 同註33，頁10。

³⁷ 同註12，頁207。

³⁸ 明·張岱，《石匱書·科目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卷廿七，頁2。

³⁹ 同註23，頁36。

⁴⁰ 同註23，頁35。

⁴¹ 同註23，頁100。

琴如《陶庵夢憶·過劍門》所載：「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⁴²磁陶銅青，精搜細羅，如〈附傳〉所言：「所遺尊、卣彝、名畫、法錦，以千計。」⁴³藝術的鑑賞生活，使張岱靈敏於別具巧思，涵養於雅致情韻，使他在文章當中，標舉主體精神的觀照，深切生活體驗的真味。《幼學瓊林·地輿》：「淄澠之滋味可辨，涇渭之清濁當分。」⁴⁴《呂氏春秋·精諭》：「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⁴⁵張岱的文理思致流動於事物中，演繹為生活的情趣，耳目所接皆成風情之樂。《陶庵夢憶》所舉的各項民俗遊藝，琴棋蹴鞠，戲曲廟會，觀荷賞月，鬥雞賽舟，校獵演武等等，琳琅滿目，應接不暇。如張則桐所言：「張岱是一位造詣精深的生活藝術家，人生藝術化的觀念貫穿了他的一生。晚年雖然在貧困窘迫的物質生活中，我們仍能從他的詩文中感受到新鮮的藝術情趣。」⁴⁶而《陶庵夢憶》是張岱藝術化人生的結晶。茶淫橘虐的生活，豐厚了張岱的品味，包括美食茶道、器皿古玩，在文藝創作中，深刻於風姿神韻，在精選細擇中，表現出靈動的世俗歡惡，舉筆點染自成樂趣。這自然不屬於奪長搏短的意氣之爭，也當不是汨沒於物流者所迷失。

張岱以七不可解，自解命運中所遭逢的課題，一切的體悟都來自於「人生無常」。「貴賤、貧富、尊卑」上下易位，「文武之能」被重新評價，「寬猛緩急之度」被重新擇選，以至於愚智之辨，得失之權衡，都被重新咀嚼。這一段文字夾雜家國覆沒之恨，愁鬱自解之願，有悔有悟，既自我嘲諷又自我肯定，並且寓褒於貶，而最後終究完成了人生的省思歷程。

三、擺盪之錘的休止符——蓋棺論定的自我觀照

蘇軾在〈縱筆三首〉其三：「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隻雞斗酒定贖吾。」⁴⁷虛待於日與月之間是雞與酒的等候，普天下砥節守忠者，能料到此窮途末路嗎？陶淵明《雜詩》：「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⁴⁸但是回報他的遠大志向者，卻是權貴操持的庸腐官場。能逃離「舉世皆濁我獨

⁴² 同註25，頁149-150。

⁴³ 同註23，頁216。

⁴⁴ 明·程登吉，《幼學故事瓊林》程允升原本，鄒聖脈增補，謝梅林、鄒可庭參訂，臺南：成大書局編輯部，1988年7月3版，頁15。

⁴⁵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審應覽第六·凡入篇第十八》高誘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月3版，頁497。

⁴⁶ 張則桐，〈從人生取向看張岱的價值觀念〉，《古今藝文》第三十一卷一期，頁45。

⁴⁷ 同註15，頁2328。

⁴⁸ 東晉·陶潛，《陶淵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10月）頁52。

清」⁴⁹者，唯有返璞歸真於自然。直到寫作〈自祭文〉的當下：「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逾邁是時間的消逝，生命終究必須走至終點，生存與死亡既然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所以姻親摯友晨宵來奔。陶淵明以走向歸途者之心，想像死去後親友的倉皇奔走，對比於自己面對死亡的從容，筆墨略帶滑稽。此等滑稽更加添作者面對死亡的自在。「倉皇」由晨宵來奔可見。「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一句，「蕭蕭」呼應首段「風氣蕭索」，借秋之肅殺，暗喻生命終了與枯萎。陶潛說：埋葬我於荒野之中，使我魂魄安息，有別於生者，我這一趟幽深沉寂的冥途，將入蕭索秋風吹拂的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即「恥宋臣奢，笑王孫儉。」，關於葬禮的安排，我羞如宋司馬桓魋的浪費，且嘲諷漢楊王孫的薄吝。無論浮靡奢華與節省薄吝都有過「過之」、「不及」之處，都失去悼亡的真諦。「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當空虛失落的感覺消逝，悲慨之情也會漸次遠離。不會再有人到墳上來聚土種樹，時間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薄葬的苛吝，厚葬的靡費，將無益於安定死者飄浮的魂魄，無用於宣洩存者潰決的傾訴，隨時日之遠去，痛失之情淡漠，也不再時時弔念於墳前。既然如此，又何必計較於厚薄，俗人自擾罷了。順乎人情，盡乎心意就好了，既然如此，又何必窮盡有生，汲汲奔走於鑽營。

「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嗚呼哀哉！」我既然已不重視生前的虛名，又怎麼會注重死後的歌功頌德。人生在世實在艱辛，死又有什麼關係呢？嗚呼哀哉！為什麼世人總是想不透，而有那麼多的牽掛與不捨呢？前後兩個「嗚呼哀哉」：第一個表達生離死別之痛，人情所難免，陶淵明也為之嘆息。第二個表達名利毀譽之追逐，終生難已，死後都將落空，世人為何淺薄而不能通達。在行將就木之際，〈自祭文〉中還不失幽默的，為世人一發扼腕之嘆。充份表現了從容不迫的態度。

張岱在〈自撰墓誌銘〉中自我論定：「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總結一生，張岱可說是富貴人，無論前半生浸淫藝術玩賞的頹廢，或後半生筆耕著作等身的績業。也可以說是貧賤人，無論明亡前的孤芳自賞，遠離功成名就的追求，或明亡後的破敗流離，悔恨摻半的自咎與自責，兼以擔糞自虐求生的困苦。「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也可以說張岱具有智慧，否則怎麼能擁有跨越各領域的筆墨傳世，張則桐：「勤奮著書是張岱的價值觀念在生活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從二十七歲編成《徐文長逸稿》開始，他手中的筆一直沒有停止，去世之前還在為《越人三不朽圖贊》的刊印忙碌。張岱的著述涉及史學、經學、文學、類書等各個領域，幾乎包括了

⁴⁹ 同註1，頁477。

明清之際文藝學術的所有領域，其中史學和文學的成就尤其突出。他以宏富的著述樹立了明末清初思想文化大家的地位。」⁵⁰句括《夜帆船》在內，從存明史到百科全書，包羅萬象，從充沛活躍的筆觸，能見其不為困窘所苦的自在與自得。但是如果以不務功利的冬烘，也可稱之為不識時務的愚笨人。「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在艱困中，賴農耕以為生，尚且勇於實現理想，可以說是一個堅強的勇者。在亡國後，沒有選擇以身就義，也可以被罵為軟弱的人。「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說他躁急或懶散都可以，反正他不在乎。「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這一生的多才多藝，舉凡文人學者所沾染浸潤者，雖不能成就一家之學，但書法舞劍之術，節義文章之能，求仙成佛之思，務於農圃之勞，莫不經歷。任憑世俗人以敗家子，頹廢者，頑冥人、鈍秀才，瞌睡漢，甚或死老妖來稱呼他！檢點之下，他無愧此生，冥冥黃泉路，行之可也。

四、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的寫作特色

（一）傷春悲秋，潛藏遺憾

陸機（261年—303年）〈文賦〉：「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⁵¹本文陶淵明以秋景發端，既寫實於時序，也特別能誘發秋景蕭條的悲涼氣氛，特別能烘托行將就木之人的傷痛感懷，以及一個人即將死亡的特定情境。自楚辭以來，悲秋的文學傳統，以蕭條的秋景寄寓傷感。楚辭〈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⁵²將迎神之巫不見神靈的落寞、惆悵之情，融於洞庭湖的波風落葉聲中，愈發顯得淒清和悲涼。暗示：神明未來，來的只有蕭索的落葉，憑添傷感。「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本文中「逆旅之館」、「本宅」比喻人世，生只是暫時的借居，死才是本來的歸宿。《列子·天瑞篇》：「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⁵³陶淵明〈雜詩〉：「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⁵⁴大雁南飛而去，草木枯黃凋零，陶子將要辭別人世，永遠回歸於舊宅。「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以冥，聆

⁵⁰ 同註46，頁48。

⁵¹ 同註4，頁245。

⁵² 同註1，頁141。

⁵³ 戰國·列子，《列子》張湛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9月）頁11。

⁵⁴ 同註48，頁53。

音愈漠。嗚呼哀哉！」推想老朋友淒涼的以悲傷的態度相對，齊聚在今晚為我設宴逆行，獻上嘉肴，呈上美酒。生離死別是人生大事，悲痛與不捨是人之常情，就算是視死如歸，有大去的心理準備，但這些熟知的面容，這些熟悉的語音也將漸次遠離模糊消逝，怎不令人悲傷呢？「陶公本性嫌無病呻吟，而其祚莫不有物，乃自感覺身體之衰微，如西山殘日，秋圃荒枝，藉〈挽歌〉、〈自祭文〉之文以敘人生觀。」⁵⁵

（二）似貶而褒，正言若反

在回顧之作中，張岱作了自我觀照的省思，以多重角色自嘲。「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舉富貴、貧賤對稱，一方面表示陷於墜落的局勢中，身份地位丕變，可以見其倉皇的面貌。一方面表現屈於山野的乏困中，守節著述，可以見其操守的堅定。「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舉智慧、愚蠢對稱，一方面以得失不在於擲骰子、下棋等遊戲上，而在深切體會對生命所造就的滋補，一方面標榜自我靈動之心，對於遍嘗甘苦的主宰性。「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舉強項、柔弱對稱，一方面揭示強弱不能就表象論定，而在當爭與不當爭的價值判準。處清劣境之中，唾面自乾又如何，韓信尚且受跨下之辱。當為所當為時，則將義不容辭，躍馬干戈以之，張岱曰：「余故不能為史，而不得不為其所不能為，固無所辭罪。然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⁵⁶在文字箝制的高壓中，猶堅持著述《石匱書》。「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舉卞急、懶散對稱，表示不汲汲於世道的競名逐利錙銖必較，《離騷》：「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頤亦何傷？」⁵⁷張岱所顛頤、急切者自是千載文人脩名脩德、著書立說的大功大業。「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舉「書劍節義文章仙佛農圃」為範疇，指前半生承自晚明，狂狷不羈玩物玩世的放任所成就，藝廣多方，雖未能建立一家之說，但卻無所不涉。後半生投棄荒遐，飽受手足胼胝之苦，也練就挑糞力杵農圃之技。內容寓褒於貶，正言若反，淚眼中夾雜自得，歷數經歷，無限滄桑。「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張岱自許絕不坐困於「患人之不己知」的憂慮之中。這種自信不正是《論語·憲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⁵⁸充分表達了操之在我的自我肯定。

⁵⁵ 清·鄭文焯注，《陶集鄭批錄》卷三，[日]橋川時雄補校，文字同盟社，1927年，頁51。

⁵⁶ 同註23，頁100。

⁵⁷ 同註1，頁22。

⁵⁸ 同註33，頁154。

（三）以生悼死，對比與想像一起奔放

陶淵明在祭文中想像了臨終送別的场景，「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以冥，聆音愈漠。」對於生命的凋零，有一種置身事外的輕鬆，對於黃泉之途，有視死如歸的從容，「嘉蔬清酌」在前，如同一生所追求的平靜與樸實，生命的真味也當在清茶與淡飯之中。人生而如此，所以祭亦當如是，所怡然而自適者，解脫腐臭政治所夾帶的腥肉躁魚，將離世的軀殼無所罣礙。「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對比人我的緩急，無須議價得失。對於有限生命的對待方式，有更多的解放與鬆綁，完全脫去世事顛沛的滋擾，表現平實而豐富的生命內涵，用語簡樸、優美，不加矯飾。「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想像親友故舊，聞訊惶惶，倉促疾走。但是終究要遠離的，也只有自己的魂魄。以生悼死，情感雖平淡沖和，但是表情瀟灑，態度曠達。

（四）以死念生，感性與懷恩振臂相擁

張岱在自撰之作中，將行仍感念親恩，對於尊長憐愛培育之心，慨然回首，沒世難忘，「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宦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簍，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裸抱提攜的恩情，暖日照拂的慈輝，暄妍了篇章，也光迴照返了熒熒燭炬，能見菊老荷枯的淚水滌盡一生的塵僕，做懷恩遠行的準備。「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為錢塘遊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塘縣裡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余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感恩懷德中，猶有老驥伏櫪的悲鳴，有忝所譽的慨嘆，直到當下仍有責任未了的遺憾。他的《自撰墓誌銘》通篇文字精煉而暢達，串貫喻托，排比成諷，對比奢靡與貧窶，痛陳亡國之恨。所涉命題無不莊嚴凝重，然而乞兒與玉帝成文，唾面與遊戲成詞，以詼諧調謔，寄寓嚴肅的獨白。自陳癖嗜，非祭文「隱惡揚善」之常法，但是對比於「著作等身」，又有志拔能超之卓絕。有懷慕、有悔恨，有自責、有自強，多重對立的情感，成為張岱豐富的人生經歷的最佳寫照。

伍、結語

雖然面臨死生之大限，但無張惶之憔悴。料定必然，所以從容以之。因此，有更多冷靜的時間，做自我獨白的檢視。回溯高風張帆的險境，或泥船渡河的窒礙，消融在歲月的灰燼中，瀝血猶帶腥臊的痛，滋育灰燼，成為宏富生命內涵的動力，在自為之作中散發光亮，成為不朽。張岱在墓誌銘言：「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為之。」舉了王績、陶潛、徐渭等人之作。正因為這些作品，在時窮困躓中，表情真摯，率真於自我獨白的觀照，具有生動的感動力。影響所及，張岱效顰之作也突出優異，尚繼武曰評之：「其文文筆跳宕峭快，時而沉著鬱憤，時而輕靈明快，時而貌莊令人深思，時而詼諧催人反省，在歷代自題墓誌銘文叢中，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思想內容，折射出張岱曲折多難的人生經歷，和卓然持異的文化人格。」⁵⁹自撰墓誌銘的體裁，從漢哀帝杜鄴起，到張岱的自撰之作，可以說是出類拔萃。葛洪（284年—363年）《西京雜記》：所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晏息。』及死后，命刊石，埋於墓側。」⁶⁰簡陳事略，僅供後人按碑稽考。到了陶淵明，一反〈薤露〉、〈蒿里〉的恐懼和憂傷，表達面對生死的坦然，對曲終人去的讚禮，帶陶式的幽默口吻，勘破形體與精神的真正自由，自是一大特色。包括王績的自撰之作，不寫世系，甚至於日地不在陳述臧否，也不細數功蹟，全然是抒發自我的情調，自我獨白的口吻，對於祭文寫作形式的解放，亡者真切自我的表白，有別於形式的堆疊，有別於他撰墓誌銘，涵詠豐富自我追悼之情。

唐代的自撰之作，裴度（765年—839年）只留「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為臣之道，備乎國史。」⁶¹片語隻辭。而顏真卿（709年—785年）因平亂而遭害，雖然有墓誌之作，沒有傳世。韓昶（？—855年）自為之作，自陳世系及己所傳，布陳細瑣，「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語。因與俗乖，不得官。」偶發牢騷，以銘文略表個人的蹉跎，平凡無奇。銘文：「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為賢，而白黑分。眾以委委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雖然一吐不遇之痛，但是敘述空存憂惱，而並不深刻。杜牧（803年—852年）《自撰墓誌銘》大量記述祖考與官歷，並涉夜夢、星象、甗裂等事以為死亡之兆，不同於一般自省自悔自

⁵⁹ 同註12，頁206。

⁶⁰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12月），頁38。

⁶¹ 宋·王讜，《唐語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6月，卷二，頁十一，總頁60。

悟自得之作，無法呈現個人自我評價的觀點。無如袁枚（1716年—1797年）自輓詩：「人生如客耳，有來必有去。其來既無端，其去亦無故。但其臨去時，各有一條路。…逝者如斯夫，水流花王住。但願著翅飛，豈肯回頭顧？偉哉造化爐，洪鈞大鼓鑄。我學不祥金，躍治自號呼。作速海風迎，仙龕陪白傅。或遊天外天，目睹所未睹。勿再入輪迴，依舊詩人作。」⁶²寫得暢快淋漓，如同曹操（155年—220年）的〈善哉行〉裡所說：「人生如寄，多憂何為？」瀝乾憂慮後，袁枚也能敞懷邀請大家為其生輓，無論得到的是揶揄，或是嘲諷，或是真情挽留，或是曠達一嘆，坦然如此，竟讓他多活了好幾年，直到八十二歲才仙逝。

張岱自撰之作，抱存「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⁶³儒家聖賢立德立言立行的訓誨，發酵發光發熱，成為張岱自我價值判斷的根本，他自嘲：「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⁶⁴蘸饑為筆，悔悟故國如夢。不可自解的排比相對，造就譏諷，以詼諧相戲謔，但是所彰顯的氣節崇高，情操偉偉，態度莊嚴而蘊情深厚。相較於五十歲以前遊戲人生的態度，深刻的表達臨老悲壯的情懷，令人動容。陶潛以悟透自解之心貫串了自祭的文字，放下世事的銀鐺囚錮，自放於天地之間，與張岱成為文學上儒道自為之作的雙璧。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廣解四書》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東華書局印行，1961年。
 戰國·屈原，《楚辭注釋》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殷光熹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6月大陸初版，1993年9月臺灣初版。
 戰國·列子，《列子》張湛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9月。
 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高誘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月3版。
 戰國·莊子，《莊子·大宗師》，陳鼓應註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3月六版。
 漢·司馬遷，《史記》，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鼎文書局，1977年。

⁶²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1988年1版，2009年4月翻刷，頁823。

⁶³ 同註23，頁111。

⁶⁴ 同註23，頁110。

- 漢·戴德、戴聖漢·戴德、戴聖，《十三經注疏》八，《禮記疏卷》鄭沅注，孔穎達疏，據嘉慶20年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
- 東晉·陶潛，《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 東晉·陶潛，《陶淵明全集》，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10月。
- 東晉·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據陶文毅集注本，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12月。
- 《兩漢魏晉十一家文集·揚雄》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5月，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3版。
- 南朝梁·蕭統，《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9月6版。
- 南朝梁·蕭統，《文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 唐·王績，《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6月。
- 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冊二，《四部備要》據東雅堂本，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3月1版。
-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序傳》清·浦起龍釋，白王崢校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 宋·王讜，《唐語林》，臺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6月。
- 宋·蘇軾，《蘇軾詩集》，清·王文誥、馮應榴輯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 元·陳秀民，《東坡文談錄》，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刊集成》，1969年。
- 明·吳訥、徐師曾合著，《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 明·程登吉，《幼學故事瓊林》程允升原本，鄒聖脈增補，謝梅林、鄒可庭參訂，臺南：成大書局編輯部，1988年7月3版。
- 明·張岱，《張岱詩文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明·張岱，《石匱書·科目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 明·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尋夢》，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
- 明·徐渭，《徐文長三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臺北：偉文出版社，1976年。
- 清·汪汲著，《事物原會》，據清古愚出房藏本影印出版。揚州市：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二書庫A區，R 041 131。請洽一樓出納組調閱館藏。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1988年1版，2009年4月再版。
- 清·鄭文焯注，《陶集鄭批錄》，[日]橋川時雄補校，文字同盟社，1927年。

二、近人著作

- 川合康三著，《中國的自傳文學》蔡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6月。
- 余德余，〈甘灑熱血存「春秋」—張岱〈自為墓誌銘〉現象窺探〉，2004年6月，《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4卷第3期，頁40-44。
- 尚繼武，〈自為墓志寫心曲-張岱的特異文化人格探窺〉《前沿》，2005年，第5期，頁206—209。
- 張則桐，〈從人生取向看張岱的價值觀念〉，《古今藝文》第三十一卷一期，頁44-49。
- 劉繼才，〈王績與陶淵明比較論〉，《江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頁69-80。